

在我母亲家的

三天

[法] 弗朗索瓦·威尔冈 著

金龙格 译

Trois jours chez ma mère

François Weyergans

2005 年度龚古尔奖作品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法)威尔冈(Weyergans, F.)著;
金龙格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249-8

I. 在... II. ①威... ②金...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2267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肖萍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世纪文景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法] 弗朗索瓦·威尔冈 著
金龙格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03,000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249-8/I·298
定价 20.00 元

1

“你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昨天晚上，戴芬娜冷不防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场有可能激化的交谈就此画上了句号。我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会迫使她丢出这样的话来，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判决宣判啊。在过去的日子里，乃至现在，我都得忍受来自这个被我称作“我的小戴芬娜”的女人的所有令人懊恼的事情，尽管她身高一米七八，我还是叫她“我的小戴芬娜”。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三十多年了。戴芬娜是我想像中的那种女人，如果有一天，我必须死在医院里的话，她会守在我的病床边，朝我俯下身子；我说的是死在医院里，而不是死于飞机失事，倘若是死于飞机失事，她可能也会和我在一起。昨天晚上，我就不得不忍受一场没有死刑那么严重的判决，当然没那么严重，但是，这个判决却没有一点宣告无罪的特征：我，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导演过五部电影，出版了十部小说，我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

这样的句子，若是在我煞费苦心购买记事本并使用记事本

的那个时代，我会在记事本上把它记录下来，可是，我不再安排什么约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记录的了。何苦要记录下这样一个句子？它又不是那种教人一转身就忘记的句子。

戴芬娜没有说我让她提心吊胆。可这“所有的人”从何说起呢？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两个女儿，两个非常清楚她们的父亲正陷入困境的成年女子吗？肯定包括她们。可能还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和妹妹们。可是，戴芬娜就像我一样，几乎不去看望我的家人；我不怎么去看望我的母亲，心里愧疚得很。我几乎每一天都对自己说，应该到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去看望她，她的家在那里，她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但我总是下不了决心。在电影《八部半》^{〔1〕}里，基地的那组镜头中，当马斯特洛亚尼扮演的那位导演看见他父亲突然出现，他难过地发现他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爸爸，我们之间的话那么少！”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轮到我悔恨，不是悔恨自己跟妈妈说话太少，因为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给她打电话，而是后悔太少见她，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以来。我那八十高龄的老母说的比我还要绝。她在电话里下了结论：“总而言之，我这一辈子将不怎么会见得到你。”

这句话可真是一语中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明白，可是，见我不言语，她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是真的！你很早就离开了家门，你那时多少岁来着？十七岁，还是十八岁？”

〔1〕《八部半》1963年由意大利出品，导演费里尼，马切罗·马斯特洛亚尼等主演。以导演费里尼本人的经历为基础拍摄而成。

“十九岁，妈妈！”

“是啊，你看看今天的年轻人多大一把年纪还呆在他们的父母家里，就知道你离家也太早了一些。”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她每年都要来巴黎好几趟，在我家里住几天，在我妹妹玛德莱娜家里住几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她来看我。如今，她几乎足不出户了。要来一趟巴黎的话，她事先还得跑去咨询一位专家，而且她觉得最好的专家在马赛。马赛离她住的地方不到一百公里，她都嫌路途遥远。

我的一些朋友也一定把他们内心的忧虑告诉过戴芬娜。我敢打赌，在我睡觉期间（我一般情况下要到下午过完一半的时候才睡醒，有的时候还要晚些），她接到过他们的电话：“弗朗索瓦怎么了？他都查无音信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看上去精神不太好。我们很担心他。”当戴芬娜告诉我，我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的时候，她的声音低沉得就像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中的钢琴声，或者像维瓦尔第《海上暴风雨长笛奏鸣曲》中的巴松管的声音，总之，天空中有暴风雨，这绝不是一杯水中的暴风雨。我们的共同生活跟一杯水没有任何关系。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刮起飓风。风从两个方向刮来会生成旋风，我这么回答，还补充说“风暴角”因为有了“好望角”这个名字而举世闻名，说希望和风暴之间的关系，与爱恨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相比，更不在正常状态。我还说到拉丁语中的暴风雨（tempestas），既有好天气也有坏天气的意思。我拼命挣扎，企图摆脱困境，但戴芬娜看得明明白白。我不仅让所有的人提心吊胆，我

还让自己提心吊胆。

我本该承认这一点的，而不是固执己见，还扯到普赛尔的《暴风雨》^{〔1〕}中那位呼唤风的男高音。我不大记得这场《暴风雨》，它是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所做的舞台音乐。我更熟悉莎士比亚的那个剧本。当我阅读那个剧本的时候，我总是把自己当成普洛斯佩罗那个老魔法师，他像我一样，喜欢书斋胜过一切。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听普赛尔的音乐了？我的两个女儿就是听普赛尔长大的，她们爱在吃早餐的时候放他的曲子，其中就有克劳斯·诺米^{〔2〕}或者阿尔弗雷德·戴勒^{〔3〕}的演唱。所有那些三十三转唱片^{〔4〕}我都保存下来了，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橱柜里，两个女儿三天两头要我放给她们听。她们对我说：“你现在听音乐比以前少了。”在她们看来，这是个不好的兆头。

为了创作，我从出版社预支了一些版税，但那些书我才写了开头部分。我不再出书了。再也没有出书的欲望了。“我的上帝啊！真是奇怪，一本书卡壳后，就再也写不出来了。”莫里哀写道。我从一本关于拉辛的书中了解到，有人指责他声称撰写路易十四的历史

〔1〕 亨利·普赛尔(1659—1695)，是巴洛克早期的英国作曲家，曾历任查理二世国王弦乐队的作曲师，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管风琴师，皇家教堂的三名管风琴师之一，曾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谱曲。

〔2〕 克劳斯·诺米(1944—1983)，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第一位死于艾滋病的古典音乐艺术家。

〔3〕 阿尔弗雷德·戴勒(1912—1979)，英国男高音歌唱家，被称为“二十世纪假声男高音之父”。

〔4〕 指传统的三十三转黑胶木唱片。

得了一大笔钱，却一行字也没有写出来。我在这一段文字上做了标记。事实上，拉辛创作很勤奋。我也一样。为什么要扯上戴芬娜，为什么戴芬娜自投罗网，把自己也卷进这种疯疯癫癫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正在演变成这种疯疯癫癫的生活。有一天，她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她的想法：

“我们过的是一种疯子过的日子，或者不如说我们就是两个活着的疯子。”

而且，有些情况她还蒙在鼓里呢。我向她隐瞒了那些只写了我本人名字的邮件。几个月以来，我都不敢离开我那套房子半步，害怕执达员趁我不在家的時候突然登门，害怕是她跑去开门。到时候她会急得六神无主的。

如果我是独自一人生活，那么我就有权成为一个不可救药、鼠目寸光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并不是这种人。对柔爱和沃格琳德来说，我是哪一种类型的父亲？当我读到一些心理学家在他们的书中列举的、他们认为父亲不应该扮演的那些角色时，我在那些句子下面画了很粗的杠杠；我想着自己的角色，非常认同他们的观点，即便是在他们提出惟一有实际意义的父亲是精子这种论调的时候；但我心里想的却是“但愿我的两个女儿不要看到这些”！后来，我把那些书藏了起来。亲爱的柔爱，你的名字源自希腊语名字 Zoépoiétiki，是生命、创造者的意思！还有你，沃格琳德^{〔1〕}，这是莱茵仙女的名字，

〔1〕 中世纪叙事诗《尼伯龙根之歌》中司智慧的莱茵少女水精灵的名字。

是黄金的守护神……你们小的时候，经常要我讲你们两人名字的来历。

如果我最终能把书写出来出版，我就会更经常地跑回去看我母亲。自责，我这种人是不会有。我有一些遗憾，可遗憾和自责，那是两码事，无论哪一种自责都有“痛心疾首”的那一面，而我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刺痛。在遗憾之中，就没有隐含那么多的恶意。人们总是不加评判地否认过去。自责阻止我们一往无前，而我每天总会跟一个网球运动员一样，握紧拳头，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加油，弗朗索瓦，你要想走出困境就一往无前吧！”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用印地语、巴利语和梵语创作出的文学作品都写到，生活的规则就是一往无前。生活的车轮在滚滚向前，谁能将车轮刹住？戴芬娜不需要一个婆罗门^{〔1〕}，不动声色、似笑非笑地告诉她：“我们的未来，从某个角度看，足以令人惶惶不安。”

我很快就要步入花甲之年了，戴芬娜亦是如此。假如某天晚上，我们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家里用晚餐，我们吃完晚餐离开后，他会怎么评价呢？说“夫妇二人都有强烈的虐待狂倾向”吗？他会不会明确地指出：“男方不缺乏明确的受虐狂意愿”？假如身处“伟大的世纪”^{〔2〕}，人们会怎么想我们？一些廷臣看见我们从凡尔赛宫花园里走过，他们会说：“快看这个风烛残年的王妃和她那老气横秋

〔1〕 印度封建种姓制度的第一姓氏，僧侣。

〔2〕 法国人指十七世纪。

丈夫。”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名初中生，当时我把它套用到我的父母身上。我已经不记得这句话的出处了。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的年纪跟我的年纪一样。她众多信奉天主教的朋友——不管是伪装虔诚，还是真的笃信宗教——连同我的姐姐、妹妹和我本人，都一致认为，她符合圣保罗^{〔1〕}描述的寡妇形象。对于我的孙辈们来说，圣保罗将只是巴黎的一座地铁站的名字，或者美国明尼苏达州州府的名字——我不希望我的孙子们去那个地方，那也是弗兰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2〕}的出生地。明尼苏达州没有蓝色海岸那么富有魅力，菲茨杰拉德是不会对我这句话做出反驳的，即使蓝色海岸很久以来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天堂了，不过当我从卡西的白岩饭店的阳台上眺望卡那依海角，或者当我在昂布希城根一带散步时，我坚持认为蓝色海岸依然是某一类天堂。在我死后，我的孙子们在我的书架上发现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的那一天，他们会很纳闷我怎么会对这些太多愁善感的故事感兴趣。别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圣保罗吧，他可是基督煞费苦心、亲自出马并使其眼睛失明三天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使徒之一^{〔3〕}。圣保罗记录下了他对于婚姻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事小事的诸多劝勉，这都是些使人沮丧的劝勉。他说寡妇可以自由地嫁给想嫁的人，只是要

〔1〕 圣保罗（？—67？），基督教使徒，《圣经·新约》中《保罗书信》的作者。

〔2〕 F. S. 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小说家。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3〕 在保罗前往大马色去捉拿信徒的途中，被天上的光照射，眼睛失明，后耶稣的门徒亚拿尼亚使他双目复明，从此保罗皈依耶稣。

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但他接着又迫不及待地补充说，一个寡妇若不再嫁会更有福气些^{〔1〕}。圣保罗是这样一类人，对什么事情都要评头论足，连头发的长短和吃肉的方式都不放过。他对奴仆们说：“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还要妇女们“在会中闭口不言”。

在过了几年圣保罗式的寡居生活之后，我母亲爱上了一个年龄比她小的男人。

她首先把这条消息分别告诉了她的五个女儿，然后才到我，她的独子，我却早已从她的几个女儿嘴里知道了这个事儿。我的姐姐克莱尔以前一直在说：“妈妈应该开始新生活。”她希望母亲再婚吗？我讨厌婚姻。我觉得万幸的是，那名男子已经结婚了，这种情况可能会让圣保罗暴跳如雷。那男的有四个孩子，全都成家了，他本人跟他妻子住在一起，那个女人病得很严重，绝不能让她知道这件事情。晚上，他得随便编一个借口，走到外面去，把自己关在一个电话亭里面，偷偷地给我妈妈打电话。有一天，她在等他的电话，却迟迟都等不来，她便把心里话告诉我：“你明白的，我并不想伤害他的妻子，她那样已经够痛苦的了，我不希望她死，但那毕竟会缩减她的痛苦。”

那人名叫弗雷德里克·特鲁贝，经营一家纸板厂，自己做老板。他编造借口，要到国外去做市场调研，时而去南韩，时而去芬兰，然

〔1〕 见《圣经·新约》中《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九节：“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

后把我母亲带到阿讷西湖边，或巴黎周边那些漂亮舒适的宾馆里。当他从圣日尔曼—昂莱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如何才能让他的妻子相信他是在赫尔辛基呢？怎么设法应付宾馆的电话号码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知道他在我母亲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之前，我见过他的一幅照片，在一家大酒店的游泳池旁边，他站在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旁边。那是一幅冲印出来的彩色照片。当时，我的心思都放在照片上那个着泳装的女孩身上了。她是谁？我母亲告诉我，她是我一个外甥女的朋友。我会更愿意向这个游泳的女子献殷勤，她站在跳台旁边，还没料到她的父亲就要变成我母亲的情人。和母亲情人的女儿上床，这样的乱伦如果按震级来算，该是里氏多少级？

不只是弗雷德里克比我母亲年纪小，他还真的以为母亲比他小呢。我母亲为此沾沾自喜：“我没有把他的错误指出来，他从未看过我的身份证。幸好在宾馆里从来都没有人问我要。我并没有撒谎，如果他认为我比他小五岁，那也不是我的过错。”所有的人都同意她的说法。我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

“这只是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我的姐姐和妹妹们都这么说，她们生活中的男人可不在少数。我又想起我的一个外甥女，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她完成一篇“论文”。突然她要结束和我的谈话，就像她说要买一台微波炉一样，语气冷漠地对我说：“妈妈带她的情人回来了，我要让他们单独呆在一起，我挂了。”我甚至没有时间问她，她的父亲在哪里。

我的姐姐和妹妹们说到她们的母亲的感情生活时，带着关切，就像巴黎歌剧院的特级舞蹈演员指导歌剧院舞蹈班的年轻学生一样。妈妈把弗雷德里克·特鲁贝介绍给我们的那一天，对特鲁贝来说，问题就不是去斯堪的纳维亚谈纸浆生意那么简单，也不是对抗他的董事会了，而是要接受由我姐姐、妹妹和我这些神情严肃的权威人士组成的“刑事法庭”的审讯。我们前一天就在电话里通过气：“那一定得是个心地善良的家伙。没有别的可能性。”我们家就像天底下所有的家庭一样，是个危险的家庭。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在哪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意外。倘若我们不是在一起长大的，我们的关系肯定融洽不到哪里去。再简单不过，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见面。但我们拥有这种使我们像骨肉一样难以分离的共同的童年，有这种难以抹去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言喻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从没停止过给我们带来益处或伤害，有时是益处，有时是伤害，要看是在什么时候。我还想知道，我的初恋对象是不是我的姐姐克莱尔。如果我告诉她，我到达性欲高潮时叫的是她的名字，而不是那个与我做爱的女人的名字，她是不可能一点都不吃惊的。她只要去问问戴芬娜就行了。当我喃喃地说着我正在抚摸的那个女人的名字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所有跟我睡过的女人的名字一起涌上心头，我必须拼命克制，才不至于把她们其中一个人，有时甚至是几个人的名字叫出来，反而不是那个本来应该喊出来的女人的名字。碰到这种时候，我一边相信我搂在怀里的女人可以替代、概括或者废除其他所有的女人，一边消除疑虑，但这么做非但不让人放松，反而使人心情

更加沉重。两种能够被感知的东西总有一些共同之处,这就是相似的规律。一个音节,有的时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元音,就足以让一个含有同样元音和音节的名字冒出来。出现把克莱尔和戴芬娜的名字弄混的情况后,我费了一些时间来回忆,这才想起我小时候给克莱尔取了个绰号叫“戴丽丝”。我们常常受到一些陌生的规律的支配,一些不可改变的硬性规律,就像句子中,一个词语与另一个词语相互关联的语法规则一样。当那些从属连词后面需要接虚拟式的时候,就不能随便使用直陈式^{〔1〕}。同样,我也不能随便把一个女人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割裂开来。

与弗雷德里克·特鲁贝的见面安排在夏天,在八月份,我们的父亲去世五年半之后,在普罗旺斯那栋房子的晒台上。我们曾不止一次在那栋房子里度假,而房子现在只剩妈妈一个人住。从前那是一座隐修院的房子,父亲只花了一点点钱,就把它从迪涅的主教手里买了下来,那是在1954年或者1955年。房子刚买下来的时候破旧不堪。去那里要走泥巴路。当时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要到附近一家古老的隐修院的水井里汲水,而那座隐修院已经一块石头都不剩了。我姐姐、几个妹妹和我,与蜘蛛、蝎子一起分享里面的一间宿舍,它曾经历过美好的岁月。对于了解该地区的人,我可以告诉他们,那是在卡尼奥尔和雷维德布鲁斯之间。也是在这栋房子里,冬

〔1〕在法语中,像 *avant que*, *pour que*, *à condition que*, *bien que* 等表示时间、目的、条件、让步等意义的连词或连词短语引导的从句要求用虚拟式。

日的某一天，1974年2月5日，我父亲为了赶出一篇文章，必须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叮嘱我母亲务必在中午之前叫醒他。她上楼去叫他起床，前后叫了他二十回，最后实在叫不醒时，就去摇他，这才发现他已经撒手人寰了。

在夜间守灵期间，我父亲躺在一张灵床上，那是当天早晨我和母亲两人亲自动手用绣花的白色亚麻布铺好的。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把床单垫在下面的了，因为一个死人比病人更不容易对付。入殓的时候，殡仪馆的两名工人直截了当地把父亲的遗体塞进一个特别大的灰色垃圾袋里，然后把这个包裹放进棺材，我感觉我母亲都要晕过去了。

下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墓地回来了，这块墓地完全可以在《米其林指南》中享有一颗星。我们在富卡吉埃停下来，想在塔各里亚那兄弟的肉铺里买点猪肉，那兄弟俩不愿收我们的钱，说：“你们的父亲和我们是好朋友。”父亲生前特别喜欢吃他们店的百里香油橄榄。我姐姐和四个妹妹穿着黑色的西裙套装，漂亮极了，几个女儿都如花似玉，她们的父亲会为她们感到骄傲的。她们临时安排了一个冷餐会，为所有来送葬的客人准备了饮料，他们大都来自很远的地方，给我们送来勇气和安慰。为什么生命要在我们的葬礼之前戛然而止？而葬礼却是我们保证能够成功的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我常常想像自己的葬礼。我在一名年轻的女画家那里预订了一副棺材，当然啦，我和这位女画家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艳遇。葬礼仪式在一座机场，或者在一家剧院里举行，有时

是在上拜恩^{〔1〕}的一座巴罗克式教堂里。这种别出心裁的葬礼，就像人们所说的“别出心裁的樱桃酒”（这种酒里并不含樱桃）一样，它的意义在于死者在其中扮演的是主角，尽管他不说话。能够把自己的葬礼想像得奇异无比，足以证明这个人依然活在人世。

借着招待弗雷德里克的机会，妈妈成功地把她的六个孩子聚到了一块，这是父亲死后的头一次，可以说母亲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母亲把她珍藏的水晶高脚酒杯都拿了出来。在晒台上，在椴树下面，我一边回忆爸爸的葬礼结束之后我姐姐和妹妹们为客人倒酒的情景，一边把弗雷德里克带来的标有酿制年份的第一瓶香槟酒的木塞拔掉。弗雷德里克显得无拘无束，依次向我们每个人投来微笑。他跟我们说起他在非洲的旅行经历。他对肯尼亚非常了解。他想带我母亲去游览离蒙巴萨^{〔2〕}不远的印度洋边的海滩。母亲回答说，她更喜欢回到威尼斯。他说到乞力马扎罗的山坡。母亲问他是否看过《乞力马扎罗的雪》^{〔3〕}，那是她最喜欢的演员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弗雷德里克几乎不进电影院。我告诉他我母亲是个超级影迷。他们还没有时间涉及这个主题。我妹妹贝内蒂克特虽然拿的是心理学文凭，但曾作为会计在南非工作过，她问的

〔1〕 德国地名。

〔2〕 肯尼亚城市。

〔3〕 根据海明威小说改编，由亨利·金导演，苏珊·海华德和格利高里·派克主演。

是茅茅人^{〔1〕}的暴动给肯尼亚烙下了什么印迹。我们觉得弗雷德里克是一个离政权很近的商人。他经常与乔莫·肯雅塔^{〔2〕}会面。我已经记不得是谁开始说到外号,我很担心弗雷德里克要我们叫他的外号弗雷德、弗雷地或者弗雷多什么的,但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他也没犯任何错误。喝过香槟酒后,他邀请我们去吕贝龙酒店。为了以防万一,他事先在阿普特的一家餐厅订了一桌八个人的酒席,那家餐厅才开业不久,面朝河堤,他和我母亲已经去过了。我们开了好几辆车。我母亲上了弗雷德里克的那辆。我姐姐和所有的妹妹都开车。我也一样,也开车,但我早该放弃的。我一握方向盘就特别紧张,我的视力出了问题,当我超车时,估摸不出迎面开来的汽车的速度。我看不出车距在缩短。在六十年代初,我从汉堡开车,穿越德国到那不勒斯几乎是一路不停,只是偶尔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停下来,在车里睡那么两三次。那时我二十五岁。

当我们离开餐馆的时候,弗雷德里克独自一人上了他那辆沃尔沃。他要去于泽斯与正在他大儿子家度假的妻子会面。开车要不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母亲上楼睡觉去了,我的一个妹妹在厨房里开始说道:“真奇怪,他让我想到爸爸,他跟爸爸一样高,音质也一样。”妈妈从不掩饰她对男低音的偏爱,低沉的声音,沙哑热情的声

〔1〕 茅茅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肯尼亚吉库尤人的一个秘密组织,以暴力驱逐白人。

〔2〕 乔莫·肯雅塔(1891—1978),肯尼亚民族主义之父,1964—1978年任肯尼亚总统。

音,就像她的丈夫一样,她丈夫可是演讲高手。她也只喜欢个头高大的男子。我父亲身高一米九,我母亲身材却不高,估计只有一米六。所以,她一辈子都得穿高跟鞋,也因此患了脊柱侧凸或脊柱后侧凸〔1〕,让她吃了不少苦。

我们都知道妈妈是在一场晚宴上与弗雷德里克认识的,酒精无疑为她壮了胆。我母亲生活中两个男人的共同点(与一个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与另一个每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使我注意到,爱情的发生有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条件必不可少,幸好仅凭这些条件还不够。“你爱一个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贝内蒂克特问我。而我更清楚的是,哪些理由阻止我去爱一个女人。她必须不跟我姐妹姐妹中的任何一个人同名,还有她不能是黑眼睛,不能和妈妈一样矮小。

“我爱过的女人并不多,我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她们的眼睛不是绿色就是蓝色的。但所有和我谈过恋爱的金发碧眼的女子,我远没有全部爱上……”

“反正,你不是为法国南方女人而生的!戴芬娜的眼睛是绿色的,是真的。”

我是独自一人从巴黎过来的。戴芬娜和两个女儿都在瑞士。我的姐姐和妹妹们也都是一个人来的。她们的丈夫(我想那一年她们都已结婚或者再婚),天知道他们在哪里。弗雷德里克从于泽斯

〔1〕 俗称驼背。